

《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金聖歎評《史記》

（清）金聖歎 撰

叢刊主編 張新科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金聖歎評《史記》

（清）金聖歎 撰

劉彥青 整理 張新科 審定

《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張新科 主編



廈門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代號：JC18N1360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金聖歎評《史記》／(清)金聖歎撰；劉彥青整理。—西安：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8.9

(《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 張新科主編)

ISBN 978-7-5613-9920-0

I. ①金… II. ①金… ②劉… III. ①《史記》—研究
IV. ①K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079505 號

金聖歎評《史記》

JINSHENG TAN PING SHIJI

(清)金聖歎 撰 劉彥青 整理

出版統籌 / 雷永利

責任編輯 / 馮新宏

責任校對 / 馮新宏 李月辰

出版發行 /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西安市長安南路 199 號 郵編 710062)

網 址 / <http://www.snupg.com>

經 銷 / 新華書店

印 刷 / 西安日報社印務中心

開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張 / 8.125

字 數 / 170 千

版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 ISBN 978-7-5613-9920-0

定 價 / 38.00 圓

讀者購書、書店添貨若發現印刷裝訂問題，請與本社高教出版中心聯繫調換。
電 話：(029)85303622(傳真)；85307826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
“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

總序

我國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展現了從黃帝到漢武帝時期中華民族三千年的歷史，它既是一部宏偉的史學巨著，也是具有不朽魅力的文學名著，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中國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兩千多年來，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史記》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從而形成一門新的學科——“史記學”。就中國古代的《史記》文學研究而言，漢魏六朝時期就已經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話題，如《史記》敘事問題，司馬遷“愛奇”問題，《史記》《漢書》比較問題，等等。此後，隨着史傳文學的獨立、唐宋古文運動的發展、明代復古文學的興起，以及宋代以來印刷技術的不斷提高、出版事業的逐漸繁榮等文化背景的變化，《史記》的文學地位不斷鞏固和加強，因而從文學角度研究所得之成果也日益豐富，直至清代，形成了《史記》文學研究的集大成期。在這一段，產生了大量論著，對《史記》的文學價值進行多方面的探索。這種種研究，曾對建構《史記》的文學經典地位

起到了積極作用，而時至今日仍具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是促進《史記》文學研究更深入發展所必需借鑒利用的參考典籍。

但是，由於各種原因，許多有價值的《史記》文學研究著作至今沒有得到整理和研究。為了進一步挖掘這些古代學人《史記》文學研究著作的價值，系統地認識《史記》文學研究史，有必要對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論著進行重新整理。本叢刊在較全面調查文獻資料基礎上，選擇了十多種民國以前有關《史記》文學研究的重要典籍，加以校勘標點，整理成更便於閱讀和利用的新版本，目的在於為當代《史記》文學研究提供可靠的資料依據。本叢刊選擇典籍的基本原則是：

(一) 着眼於文學性的研究著作。《史記》首先是史學著作，因而在《史記》研究史上，有大量從史學角度研究《史記》的著作，尤其是清代乾嘉學派的考據著作，但由于不合本叢刊的整理宗旨，所以，一般不在收錄範圍內。儘管《史記》不是虛構的文學作品，畢竟是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充分施展了文學才華。因此，我們在着重于文學的同時，對有些具有文史交融性的研究著作，從大文學觀念出發，也適當予以選用。

(二) 避免重複性的整理工作。近年來，《史記》研究不斷深入，資料整理工作也取得了較大成績。一些《史記》文學研究的著作，已經被學人們整理并出版，如姚苧田《史記菁華錄》、牛運震《史記評注》、凌稚隆《史記纂》、湯諧《史記半解》、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儲欣《史記選》、李晚芳《讀史管見》、吳見思《史記論文》、李景星《史記評議》，等等。這些著作在《史記》文學研究方

面雖各有其獨特之處，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複整理，重複出版，本叢刊就不予收錄了。所以，我們經過認真甄別，選擇那些未曾整理及出版的《史記》文學研究典籍進行點校整理。

(三)注重多樣性的學術視角。古代《史記》文學研究著作，與今天的學術專著有所不同，或評點，或概說，或隨筆，或雜記，或感想，形式多樣，角度多種，層次多面，雖在理論體系上不夠完整，但都能給讀者及學人以諸多的啟發和思考。本叢刊所輯選的《史記》文學研究典籍，有的是對《史記》精彩語句的分類選錄，有的是從文字辨識的方面對《史記》文學文本進行解讀，有的是以詩歌形式對《史記》的詠贊，有的是對《史記》讀後感的記錄，有的則是既有個人的批語圈點，又有對他人的評論輯錄，還有的是對《史記》、《漢書》語言異同、敘寫優劣的比較。這些典籍，從宋代到近代，各有特色，對於認識《史記》的文學價值頗有意義，也能促使我們進一步反思《史記》的文學性問題。

本叢刊擬分多輯出版，其中既有原為單行本者，也有原非單行本，而是由原書中抽出獨立成卷的涉及《史記》部分者。本叢刊所收的經過整理的《史記》文學研究典籍的新版本，在整理體例上有著原則性的統一安排，如擇用善本，忠實底本，校勘謹嚴，標點規範等。在此前提下，對於具體負責各書整理工作的整理者及審定者則採取充分尊重其學術特長的態度，不做整齊劃一的硬性要求，可以自由地處理在整理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細節問題。為了幫助讀者能夠較好地了解原著的思想和意義，每種書前都有“整理弁言”或“前言”對其文學性特點和文獻學價值進行介紹分析。

本叢刊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的階段性成果，得到陝西師範大學社科處的大力支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對本叢刊的出版也給予了多方面的幫助，我們一併表示衷心感謝！

張新科

2015年8月10日

前　　言

明末清初的金聖歎將《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西廂》評為“六才子書”，有計劃對六部才子書進行系統的批判評點，其小說評點在文學史上有很高的地位。由於“哭廟案”，金聖歎並沒有完成全部六才子書的評點。雖然沒有留下一部系統的《史記》評點著作，但在已經完成的評點著作如《水滸》《西廂》中，金聖歎時不時聯繫到《史記》。此外，金聖歎有《批才子古文》，對包含 92 篇《史記》論贊（或序言）的才子古文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分析點評。通過這些與《史記》有關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其對《史記》價值的肯定，特別是其文學價值。金聖歎對《史記》文學價值的認識，從宏觀的敘事理論到細微的文章學、敘事學分析，幾乎都有涉及，在明末清初的《史記》研究中獨樹一幟。

一、《史記》與小說關係的理論探討

《史記》與小說關係問題從宋代開始被討論，宋、明時期大量

的《史記》評點注意到了《史記》里包含的小說因素。如宋代倪思、劉辰翁評《司馬相如傳》“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一段：“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並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畫就，蓋至理襲，而尤可觀。”^①指出《司馬相如列傳》中司馬相如琴挑文君故事的小說色彩。黃震《黃氏日鈔》云：“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趙奢、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概，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真奇事哉！《古史》因之，不敢易一字亦宜矣。”^②李塗《文章精義》評《項羽本紀》：“史遷項籍傳最好，立義帝以後一日氣魄一日；殺義帝以後，一日衰颯一日，是一篇大綱領。至其筆力馳驟處，有喑噭叱吒之風。”^③馬端臨《文獻通考》引呂祖謙語：“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義指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縱跡者矣。”^④等等，這類評點在宋明時期較多。這些學者對《史記》與小說的認識可以歸納為三個特點：一是着眼於《史記》中故事性較強、情節曲折的段落，從而聯繫到小說。其認識尚沒有觸及到小說人物塑造、虛構性手法等特質。二是他們對《史記》與小說的認識是基於評點《史記》，其出發點是《史記》而不是小說，涉及到小說也是著者的偶然性聯繫。所以在評點中占主體地位的是《史記》而不是小說。在評點中他們重視的是《史

^① (宋)倪思著，(宋)劉辰翁評：《班馬異同評》，《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彙編·史記》(第十冊)，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版，第152頁。

^② (宋)黃震：《黃震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4–1685頁。

^③ (宋)陳騤，(宋)李塗：《文則 文章精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第72頁。

^④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621頁。

記》的史學、文章學內容，《史記》的小說性特質退居其次。三是這些認識多是即興式、感悟式的，以文學欣賞為主，邏輯性和理論性不強。^①

這一時期，與《史記》相關的另一類評點，不針對《史記》本身，而是在評點小說過程中出現一種“擬史化”現象。即在評點小說中，用史家筆法、史家精神關照小說。如明代戲曲家李開先在《詞譴》中說：“崔後渠、熊南沙、唐荊川、王尊岩、陳後岡謂：《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脉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倘以奸盜詐偽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學之妙者也。”^②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曾說：“《三國》敘事之佳，直與《史記》仿佛，而其敘事之難，則有倍難於《史記》者。《史記》各國分書，各人分載，於是本紀、世家、列傳之別。今《三國》則不然，殆合本紀、世家、列傳而總成一篇。分則文短而易工，合則文長而難好也。”^③張竹坡評點《金瓶梅》也說：“《金瓶梅》是一部《史記》。然而《史記》有獨傳，有合傳，却是分開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傳，而千百人共成一傳，內却又斷斷續續，各人自有一傳，固知作《金瓶》者必能作《史記》也。”^④臥閑草堂本評《儒林外史》、馮鎮巒評《聊齋志異》也都談到吳敬梓、蒲松齡如何取法《史記》。這些說法對認識小說的筆法有很大幫助，但是把作為小說

^① 張新科：《史記文學經典化的重要途徑——以明代評點為例》，《文史哲》2014年第3期。

^② (明)李開先撰，周明鶴疏證：《〈詞譴〉疏證》，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頁。

^③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三國演義》(評注本)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7頁。

^④ (明)蘭陵笑笑生著：《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頁。

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等與作為史傳的《史記》的關係拉得太近，至如天都外臣在《水滸傳敘》中所言：“雅士之賞此書者，甚以為太史公演義。”^①幾乎將兩者等同看待，未免有些不當。

金聖歎的評點即屬於後者。雖然《史記》與小說的關係並不是從金聖歎開始被討論，但由於金聖歎的評點在明清小說“擬史化”評點中獨具特色，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深入而系統，已經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無疑在整個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一）金聖歎擬《史》評點的動因

金聖歎將小說與《史記》聯繫起來，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基於小說這一題材的認識。小說的來源有不同的說法，主流的觀點認為是神話傳說、諸子散文、傳記文學等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小說的產生。但是在這諸多原因中傳記文學對小說的影響可謂最為深遠，甚至可能是小說的直接來源。班固就認為小說屬於史乘的一個分支，《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②所謂“稗官”是指與史官相對的野史、小史、外史之官。金聖歎在評點小說時候，多次將小說稱為“稗官”“外史”，沿用了班固對小說的這一認識。也可以看出金聖歎在觀念中認為小說來自史官，小說與史傳有着割不斷的聯繫。但是小說發展到明末清初，早已具有了區別於史書的獨特道路，特別是在明代文言小說、白話小說繁榮發展的大背景下，小說獨特的文學藝術價值與藝術內涵已經遠遠超出

^① (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著, 吳志達校注:《水滸全傳》(下), 長沙:嶽麓書社2002年版, 第1417頁。

^②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45頁。

“稗官”“外史”所囊括的內涵。明代馮夢龍《古今小說敘》中說：“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韓非、列禦寇諸人，小說之祖也。”^①可謂代表了明人對小說的認識。明代人早已發現了先秦諸子散文中所帶有的敘事因素以及諸子散文對小說的影響。然而金聖歎越過前人的認識，直接追述到小說發生的源頭，從源頭意義出發，仍然將小說稱為“稗官”“外史”，這並非是落後的。“隨着白話章回體小說，尤其是歷史演義的興起和繁榮，作為崇奉信史傳統的文人群體的一部分，明代許多小說作者和評論者都在努力尋求小說與經史，尤其是與紀傳體史書的契合點，試圖將小說與史傳相比附，借史書以自重。”^②金聖歎借史書來提高小說的地位固然是一層原因，除此之外，明清小說擬史化評點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在小說創作、傳播繁榮的現實情況下，與之相配的小說批評理論由於起步晚、長期不受重視等原因，顯得十分貧乏，小說批評不得不借鑒這個時期已經十分成熟的詩文批評理論。^③而與此同時，受唐宋“古文運動”以及明代前後七子“文必秦漢”主張的影響，《史記》文章學的價值得到極大的重視。這也就解釋了金聖歎在評點小說中聯繫《史記》更多的是《史記》文章

① (明)馮夢龍編著,恒鶴等標校:《古今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頁。

② 白嵐玲:《因文生事——論金聖歎的小說觀》,《明清小說研究》1993 年第 3 期。

③ 參看王峰:《史傳傳統與金聖歎小說觀》,《明清小說研究》1999 年 3 期

學的內容，而非史學的內容。^①

金聖歎對小說這一題材來源認識的背後體現了他對史傳文學，特別是《史記》在小說領域的標榜。一方面是對小說地位的有意識拔高，另一方面既然小說與史書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出生背景，那麼在創作上自然可以借鑒史書的書寫，特別是如《史記》般優秀的史書。

(二) 金聖歎系統探討了《史記》與小說的關係

金聖歎認為《史記》中有諸多的小說因素，但是《史記》畢竟不是小說，對此他有系統的表述。

首先，“《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

金聖歎指出“《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並認為兩者的不同點是“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順着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由於具體而真實的歷史事件為限制，《史記》的書寫不能背離歷史的真實，而《水滸》的書寫却不用顧忌這麼多，只需要順着筆法進行寫作即可，為了藝術的真實，可以無端生造出需要的事件出來。所以金聖歎認為與《水滸》相比，要寫出《史記》這種充

^① 張新科先生認為以韓愈、柳宗元為領袖的古文運動對《史記》文學成就的推崇與接受、學習，是唐代《史記》文學經典建構的重要基石。韓愈、柳宗元等人在文學實踐上學習《史記》，從人物傳記的類型到文章的章法結構，從創作風格到語言的運用，都有《史記》的影子。“古文運動”奠定了《史記》的經典地位，參看張新科《古文運動奠定〈史記〉的文學經典地位》（《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5月30日第B03版）。同樣明代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也極大地發掘了《史記》的文章學價值。《史記》的文章學價值是金聖歎《史記》評點的重要內容，金聖歎有《批才子古文》，對包含92篇《史記》論贊（或序言）的才子古文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分析點評。金聖歎對《史記》文章學的認識無疑影響到他的小說評點。

滿小說因素的史書顯得更加困難。

其次，“修史者，國家之事也；下筆者，文人之事也。”

雖然《史記》在撰寫過程中受到“事”的束縛，但是文人並不是“事”的奴隸，金聖歎注意到文人在撰寫史書中的獨立性。依靠這種獨立性，也正是因為這種獨立性使得史書在其記錄歷史事件的責任之外獲得了新的生命。金聖歎說：“夫修史者，國家之事也；下筆者，文人之事也。”“國家之事”的目的在存一朝一代的人事，所以“止於敘事而止，文非其所務也”。而“文人之事”却不是這樣的，他說：“若文人之事，固當不止敘事而已，必且心以為經，手以為緯，躊躇變化，務撰而成絕世奇文焉。”強調了文人在撰寫史書過程中的自主性。基於此，金聖歎以司馬遷為例，認為司馬遷在撰寫《史記》中可謂體現了文人之事，“馬遷之傳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傳游俠貨殖，其事游俠貨殖，其志不必游俠貨殖也；進而至於《漢武本紀》，事誠漢武之事，志不必漢武之志也。”司馬遷為伯夷、游俠、貨殖、漢武立傳，在紀錄這些人生平事蹟之外，還寄託着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說“馬遷之書，是馬遷之文也”。漢代“一代之大事，如朝會之嚴、禮樂之重、戰陳之危、祭祀之慎、會計之繁、刑獄之恤”是《史記》成為“絕世奇文之料”。“文”與“事”的區別在於：“事”是“君相之權也，非儒生之所得議也”，而“文”是“文人之權”，“君相雖至尊，其又惡敢置一末喙乎哉！”這就將史書撰寫過程中文人的自主性提高到與“君相”之權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此基礎上，金聖歎進一步提出，在歷史事件上，“文人之權”比“君相之權”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

君相能為其事，而不能使其所為之事必壽於世。能使君相所為之事必壽於世，乃至百世千世以及萬世，而猶歌詠不衰，起敬起愛者，是則絕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驥尾而顯矣。

在關於歷史這一點上，君相固然可以憑藉自己的權勢干預一時，但在漫漫的時間長河中，文人依靠奇文所產生的影響則是千萬世，其影響遠在君相之上。

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目的固然在存事，但是在撰寫過程中並沒有局限在事本身，而是充分發揮了文人的自主性創造。金聖歎談到“馬遷之為文也，吾見其有事之鉅者而槩括焉，又見其有事之細者而張皇焉，或見其有事之闕者而附會焉，又見其有事之全者而軼去焉，無非為文計，不為事計也”。指出司馬遷敘事在敘事技巧上的側重。《史記》“為文計，不為事計也”的撰寫方法，在“事”與“文”上並沒有矛盾，“但使吾之文得成絕世奇文，斯吾之文傳而事傳矣”。即史書呈現出的奇特文采，造成了“事”賴“文”傳，“文”因“事”顯的效果。“事”與“文”在《史記》里做到了和諧統一。

如何做到二者的和諧統一，是史書撰寫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因為史書要存“事”需要如實記錄歷史事件，而文人為“文”，則需要藝術化的處理。在此金聖歎認為“如必欲但傳其事，又令纖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拳曲不通，已不得為絕世奇文，將吾之文既已不傳，而事又烏乎傳耶？”史書撰寫如果要做到事件的纖悉不失，

必然會損失其文學藝術色彩，最終反不利於事件的流傳。所以可以為了“文”而不必每一件事情都“纖悉不失”。

金聖歎認為既然“以文運事”的史家撰史都可以為了“文”的需要處理歷史事件，那麼“因文生事”的小說家更應該做到寫作中的“縱橫曲直”與“經營慘澹”。

二、閱讀法與創作法總結

在辨析清楚《史記》與小說的區別與聯繫的基礎上，金聖歎提出了一系列可資借鑒的《史記》閱讀方法。這些閱讀法幫助讀者理解司馬遷《史記》背後的真實性情，把握《史記》的藝術魅力。同時因這些閱讀法的提出是發生在其評點小說中的，是基於《水滸傳》《西廂記》這些具體的小說文本而提出的。所以它們既是《史記》閱讀法，也是《水滸傳》《西廂記》等小說閱讀法。因其分析的具體深入，具有很強的操作性，還可以作為小說家可資借鑒的創作之法。

(一) 作書之人是何心胸

金聖歎說：“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在金聖歎看來，司馬遷作《史記》有着自己的情感寄託。

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游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噴噴賞歎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